

[关键词]

印尼工业化
资源陷阱
依附性发展

包括苏加诺、哈达和普拉姆迪亚在内的印尼精英将中国的独立自主视为现代化的可选择道路，一度期待“中国的今天是东南亚的明天”。

自主抑或依附： 印尼发展道路的重重陷阱

孙云霄

在 1952 年印度尼西亚独立七周年庆祝大会上，国父苏加诺发表了印尼民族独立的雄心宣言：“我们致力于建立一个丰衣足食、一切重要的必需品都能自给自足的国家。”^[1] 此后不久，印尼国家领导人与知识分子纷纷前往新中国“取经”。包括苏加诺、哈达和普拉姆迪亚在内的印尼精英将中国的独立自主视为现代化的可选择道路，一度期待“中国的今天是东南亚的明天”。^[2] 但是，此后印尼的发展却经历了“迟滞的工业化”“早熟型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的波折，建国一代坚定自主发展的国家意志在国外压力与国内动荡下不断消磨，落入依附性发展的陷阱之中。印尼的工业发展历程是东南亚众多后发国家的缩影，它们在完成农业文明向工业资本主义转型的过程，始终面临着经济、政治与文化困境。

一、摆脱外资依赖的国家自主道路

如大多数后殖民国家一样，1945 年独立的印尼面临的经济情况并不乐观。尽管荷兰殖民者于 20 世纪 30 年代在印尼本土开启了工业化进程，促使制造业的总增加值在 1932~1941 年间达到了 7% 的平均水平。^[3] 但是，“二战”的白热化和日本的入侵迅速瓦解了这个并不成熟的工业体系；1945~1949 年荷兰殖民者的反扑进一步破坏了工业结构，阻碍了新生印尼工业的复苏。

为了摆脱初建国家的工业困境，印尼于 1949 年发布了首份“特别工业发展计划 1950”。该计划主要有三方面内容：扩大能够使用本地原材料生产新产品的技术机构的数量；由外国专家研究外国直接投资在特定大型工业企业中进行上游基础产品的生产；使用 62% 的预算在 1950~1954 年间建立 69 个工业中心，促进家庭手工业和小型工业的发展。特大型工业企业助力大城市发展，而遍及全国的工业中心惠及广大农村地区。

资金与技术短缺是工业起步的难题。议会内阁先后于 1951 年和 1956 年推出“经济紧急计划”和第一个“五年发展计划”，以具体落实工业规划。

“经济紧急计划”允许外国直接投资进入“非必要”产业。为实现独立自主的

经济政策，政府主动参与七项大型项目，以本土产品代替进口，节约外汇。在这个过程中，一批国有棉纺厂、椰干厂、印刷厂得以建立；一批大中型私有企业被政府收购，国有大中型企业数量从1940年的5473家增加到1954年的9877家。国家金融同时向纺织厂、橡胶加工厂等农村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和生产进口替代品的中型企业提供流动资金和设备投资的优先信贷。^[4]“五年发展计划”则试图以外国援助和外商直接投资为基础，吸引国外制造商与本土商人合作生产进口替代产品，填补国内技术的空白。

但这一系列工业政策并未得到有效执行。20世纪50年代初期，印尼实行议会内阁制，政治状况混乱，政党斗争激烈、内阁频频更迭、地方分裂运动此起彼伏。在追求独立自主的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依赖外国资金和技术的工业政策受到广泛抨击。1957年，苏加诺重掌政权后，提出“有领导的经济”，推出“八年发展计划”，意在加强印尼经济的国家自主性，纠正之前对外资的依赖性。一方面，苏加诺通过没收和接管外资企业，进一步扩大国有企业的规模，1964年国有企业数量已经增至24332家。^[5]另一方面，印尼政府倡导自力更生的经济发展态度，主张国有企业应该摆脱外资依赖，以自有自然资源开发解决资金问题。“八年发展计划”提出的方案是由印尼人担任领导，外国提供资金和技术帮助的经济合作的形式进行，最大限度在经济发展中保持独立自主。^[6]

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才刚起步，印尼就迎来了严峻的国际环境。1963年，英国主导成立了包括与印尼同宗同源的沙巴和沙捞越在内的马来西亚联邦，彻底激化了苏加诺与西方国家的矛盾。苏加诺不仅发起“粉碎马来西亚”行动，同时宣布退出联合国，拒绝西方国家的一切资金与技术援助。在此情形下，

1957年，苏加诺重掌政权后，提出“有领导的经济”，推出“八年发展计划”，意在加强印尼经济的国家自主性，纠正之前对外资的依赖性。



苏加诺时期，印尼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工业化发展道路

经济形势每况愈下，1960~1965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仅为2%，低于1953~1959年的平均增长率3.2%。^[7]

二、不断消磨的国家意志与依附性发展

经济情况的恶化加速了苏加诺政权的陨落，1965年苏哈托发动政变，开启“新秩序”时代。上台伊始，苏哈托并没有即刻进行工业化建设，而是通过一系列财政、金融、汇率措施稳定濒临崩溃的经济形势，进一步巩固政权。另一方面，苏哈托一改拒绝西方国家援助的态度，不仅于1966年将国有化的外资企业归还原主，而且于1967年颁布《外国投资法》及相关条例，通过给予外资优惠待遇积极争取外商投资和外国援助。正是在这一时期，美国成立国际开发署，以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论》为指南，帮助越南、印尼等国发展经济，防止它们走向共产主义阵营。自1967年起，印尼持续从美国、日本、荷兰等国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组成的“援印尼国际财团”取得长期低息贷款。这些贷款并未立刻用于工业发展，而是注入农村人口控制项目，在农村修建节育诊所、培养节育医务人员和组织大规模移民，控制农村人口，压制印尼共产党在农村地区的强大影响力。^[8]

苏哈托时期的工业发展契机得益于石油产业的繁荣。1973年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为印尼带来了丰厚的资金。此后，苏哈托期望建立印尼的自主产业，马上调整了外资政策：规定所有的外来投资都必须与本土企业合资，且本土企业占股51%以上；限制外资进入特定产业；并限制外籍员工人数。这期间，国有企业仍然是主要承担者，在强化基础工业（如钢铁、水泥、化肥）和发展高

苏哈托时期的工业发展契机得益于石油产业的繁荣。



1997年东南亚经济危机后，印尼政府放任IMF在经济改革中居于主导地位

技术战略企业（如飞机制造、造船、国防工业、电信）发挥重要作用。在充足的资金基础上，印尼经济政策的重点开始转向内需，谋求培育本国市场与私营企业。国家通过征收进口税、限制进口额、制定本地零部件含量标准、发放许可证、政府订单等措施，鼓励本国私企开展进口替代，纺织业、电器业、汽车业蓬勃发展。^[9]从1969年到1984年，苏哈托政府顺利实施了3个“五年计划”，并在20世纪70年代经历了制造业腾飞。1969~1978年间，印尼制造业产值年平均增长率都在13%，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8%，堪称亚洲奇迹。^[10]

但是，1982年和1986年国际石油价格暴跌导致印尼财政出现困难。工业政策不得不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在以出口为目标的国际市场上，印尼已落后于做了十余年国际代工厂的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因此被称为“迟滞的工业化”。对外资与技术的再次依赖迫使印尼于1983年开启经济自由化改革，不断简化进出口审批程序，取消进口特需垄断体制，降低进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放开外资限制。1991年的第二轮自由化改革更是放开了港口、电力、通信、航运等重要部门的外资限制。两轮改革直接导致通货膨胀、贫富差距悬殊等严峻的经济问题。1997年席卷东南亚的经济危机成为压垮苏哈托统治的最后一根稻草。

1998年印尼开启的民主改革不仅是一次政治变革，也是一场经济转型。亚洲金融危机在一夜之间卷走了印尼过往近五十年的发展成就。由于急需摆脱经济危机，稳定国内政治环境，政府不得不“饮鸩止渴”，又回到了依赖国际资本与西方国家援助的道路上。苏哈托后期制定的第二个“二十五年长远规划”（1994~2019）和第六个“五年计划”（1994~1999）都在经济危机和政治变革中被迫中断，代之以IMF更激进的经济自由化改革。IMF改革的主旨是推动印尼国内市场全面开放。经过六年时间，印尼逐渐走出经济危机，宏观经济走向稳步增长。但是，伴随民主改革而来的政治动荡和领导人频繁更替使得印尼缺乏长远的经济政策规划，甚至放任并不熟悉印尼本土情况的IMF在经济改革中居于主导地位。

2004年是印尼从改革阵痛期走向平稳期的分界线，苏西洛成为改革以来首位保持稳定期限执政的总统，这有利于印尼制定更符合国情的工业化政策。但是，工业基础薄弱、国内市场丢失、贪污腐败横行、新的发展政策收效甚微。2001~2016年，印尼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29.05%下降到20.51%，出口份额由0.68%下降到0.56%，进口份额却由0.54%上升至0.8%。^[11]由于印尼的人均收入仍处于较低水平，因此这一制造业衰退现象被称为“早熟型去工业化”。

三、国家自主发展道路的三重陷阱

雄心勃勃的印尼国父苏加诺，曾期望以强有力的民族主义塑造拥有宽阔国

伴随民主改革而来的政治动荡和领导人频繁更替使得印尼缺乏长远的经济政策规划，甚至放任并不熟悉印尼本土情况的IMF在经济改革中居于主导地位。

土与海域、巨量人口基数、丰富矿产资源的主权国家，赢得国际竞争的入场券。但在向工业资本主义转型中，自主发展的国家理性不只要面临国际压力，还要受制于印尼自身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困境。

（一）资源经济红利与政治不成熟

印尼是一个矿产资源极为丰富的国家。早在殖民时期，印尼的香料、热带经济作物与矿产资源便是荷兰政府的重要经济来源。苏加诺的自主性工业发展政策也高度依赖矿产资源开发计划，“八年发展计划”旨在以矿产资源开发获得的收入支持国民经济建设。^[12]其中，只在矿产资源开发中接受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援助，以最大程度减少外国资本的渗入。

尽管苏哈托借助经济危机推翻苏加诺政权，但其随后实施的经济政策仍然沿着资源补给资金的逻辑。一旦石油出口带来了充足的建设资金，苏哈托便对外资进入印尼市场进行了实质性的限制，将石油收入投入广泛的工业化建设中。1973年国际石油价格猛涨开启了石油红利阶段，为印尼经济政策转型提供了契机。从1969/1970年度到1983/1984年度，石油公司上缴的税金在印尼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19.8%上升到66%。^[13]印尼政府不仅摆脱了依靠援助才能维持常态运行的被动局面，更有了充足的资金发展工业。据统计，1973年和1979年国际石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大量资金被用于发展资源提炼与石油化工等产业。^[14]

但是，石油对于印尼而言，究竟是“恩赐”还是“诅咒”呢？^[15]在资源诅咒理论看来，印尼政府对资源的依赖给经济带来危机，也给政治权力带来结构性难题。首先，攫取资源的定位使得荷兰对印尼的殖民不同于英国之于印度。

印尼政府对资源的依赖给经济带来危机，也给政治权力带来结构性难题。



石油对于印尼而言，究竟是“恩赐”还是“诅咒”？

作为战备工业中心，印度在殖民时期即已建立了远超一般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工业化基础和生产力水平。^[16] 荷兰却伙同英美等国将石油矿山的勘探和开发作为主要产业，急于在印尼进行工业化建设，导致印尼在独立后面临基本从零开始的困境。由荷兰殖民者统治的印尼并未培养出充足的本土行政管理和技术人才，管理的落后和技术人才的缺乏掣肘了印尼的工业化进程。苏加诺的“八年发展计划”在工厂层面的实施中沦为纸上谈兵。

其次，独立后，资源经济不仅让印尼经济高度依赖国际市场，更导致印尼精英集体政治不成熟。“躺着挣钱”的便利使得政治精英要么追求短期的经济利益与“虚胖”的国民生产总值，要么短视地牺牲基础工业与技术研发能力，不顾国家经济的长远发展利益。苏哈托时期尽管拥有高速的经济发展数据，但第二轮自主产业发展基本还是围绕石油产业展开。坐享石油红利让印尼患上了“荷兰病”——“国家发展专注于自然资源的经营，往往排挤其他产业的发展”。^[17] 即使是资源下游的提炼工业，印尼也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才开始发展。即便到了民主转型十余年后的 21 世纪初，印尼依然未将资源的下游产业发展起来，摆脱不了对资源的依赖。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占优势的产业。但印尼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遭遇石油危机后，才被迫强调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苏西洛在任时期，发布了禁止原油原矿出口的禁令，却导致数个资源型大型国有企业很快濒临破产，以至于后来的佐科不得不恢复原油原矿出口。^[18]

最后，印尼精英依托国际石油市场与外国资本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同样是资源型国家，委内瑞拉依靠资源红利建立起“蓬托菲霍体制”，精英集团与社会中下层共享红利，从而兼得国家的稳定与发展。^[19] 但是，印尼长久以来只建立针对军队与公务员等少数特权群体的精英型社会保障体系，直到 2004 年才通过普惠性的《国家社会保障体系法案》，并迟至 2011 年才付诸实施。而且，在历次经济危机与改革过程中，与市场开放相伴随的是国际资本的游说、行贿与舆论，让印尼精英阶层逐步沦为寻租腐败型社会团体。

（二）自由化改革与经济主导权的丧失

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指出：“当印尼经济发展态势良好时，政府大概率会采取保护主义措施，而当经济不好时反而会采取更为开放的政策。”^[20] 印尼的改革开放总是伴随着国际资本市场的“乘火打劫”。诚然，苏哈托初上任时对外资和外国援助的开放挽救了濒临崩溃的印尼经济，也稳定了这个新生国家的政权和统一。但此后在经历石油危机和经济危机时采取的自由化改革，却给印尼工业化带来了诸多负面效应。印尼在石油红利期并没有建立起牢固的工业基础，国企和中小型企业基本都仰赖石油收入运营，一旦石油收入锐减，整个国家经济体系便陷入困境。苏哈托政府意图通过自由化改革，开放印尼的投资市场，大力引进外资以弥补石油收入锐减带来的危机。但这一过程极大地破坏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它们不仅在货币贬值中利益受损，更要面对国外消费

独立后，资源经济不仅让印尼经济高度依赖国际市场，更导致印尼精英集体政治不成熟。

品的强大竞争力。^[21]

1997年经济危机中，苏哈托再次寄希望于IMF的自由化改革计划。但是，IMF的激进改革却彻底击溃了处于危险边缘的印尼经济。改革伊始，IMF便在印尼策划关闭了16家银行，引起银行系统的恐慌，三分之二的银行出逃，引发整个银行体系的崩溃。此后，IMF叫停了15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并以暂缓贷款支持为威胁要求苏哈托政府接受“一揽子自由化”改革措施，包括废除小麦、大豆的进口垄断，废除水泥、纸的卡特尔，降低化学品、农产品的关税，撤销国民车计划的优惠待遇，放宽对批发、零售的限制，撤销对民间企业外债的政府保证等。^[22]IMF甚至出动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政要向苏哈托施压，要求其实施相关改革计划。^[23]可以说，IMF强硬的激进改革计划否定了印尼此前运行二十余年的工业体系。IMF并未深入考察印尼具体国情，一味地推行所谓的自由化改革，不但没有控制危机，反而进一步扩大和加剧了危机，最终成为苏哈托政府倒台的催化剂。

民主改革后的三届政府为了获得援助，仍然与IMF合作应对经济危机。在瓦希德和梅加瓦蒂的努力下，政府经过数轮谈判和协商逐渐从IMF手中收回经济改革的主导权。但是，即使重获经济主导权，此后的苏西洛政府仍无力带领印尼走出早熟型去工业化的泥淖。尽管资本能够迅速买来技术，但是拥有技术并不等于拥有技术能力。^[24]后者是靠国家政策的精心呵护与长期积累而成。印尼的自主发展政策不断被国际局势与国内动荡所打断，根本不具备内生的技术能力。这导致印尼工业产品技术更新速度缓慢，无法适应国际市场的变化，只能将中低研发密度制造业作为主体，产业升级困难。IMF推动的自由化改革更是挤占了国产工业产品的市场空间，直接将自主创新的技术能力扼杀在“真空”之中。

经历经济自由化改革“洗礼”的印尼已然是外资的乐园。对全球市场的依附使得国内逐渐兴起了与国际接轨的利益阶层。在石油经济中，他们逐步形成资源型腐败，能源矿产领域高官腐败频发。在自由化改革中，他们又伴随着民主化与商业化向市场型腐败发展。当精英阶层的物质利益与民族未来相冲突时，他们常常不顾民族的未来而选择保护自己的利益。面对集体性腐败，苏西洛在百日肃贪行动后也只能感叹“新民主需要时间消除腐败”。

（三）国家整合与政治改革陷阱

急速的现代化进程要求新生国家具备更高层次的政治整合能力。经济、社会现代化不一定会自生自发出民主政治，后发国家往往需要人为建构有效的政治组织，以整合日益分裂的种族、阶级、宗教与宗族等社会集团。^[25]否则，经济发展反而会带来政治动乱与政治撕裂。

碎片化的地理形态、多元的社会文化和分裂的历史状况，本就使印尼的国家建设与国族整合颇为棘手。^[26]对于统一民族的塑造，印尼或是缺乏一场伟大的革命战争，或是缺乏强大有效的政党组织。这让奠定在妥协基础上的国家

经历经济自由化改革“洗礼”的印尼已然是外资的乐园。对全球市场的依附使得国内逐渐兴起了与国际接轨的利益阶层。



碎片化的地理形态，使印尼的国家建设与国族整合颇为棘手

缺乏必要的内聚力与自主性，经不起少数几个军人的推翻或少量金钱的腐化。印尼的工业化路径和效果进一步加剧了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化以及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发展。印尼的矿产资源大都分布在巴布亚、亚齐等外岛偏远地区，而全国的行政与工业中心又集中于爪哇主岛。这就导致中央政府所在的爪哇主岛必然依赖由国家财政支撑的军队与官僚体系来维持对边缘岛屿的支配，苏哈托时期的工业化正是此种“爪哇中心主义”的经济结构表达。军事威权反过来又铸就了强大的中央集权，将外岛资源用于爪哇的建设，石油红利时期的基础建设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基本就集中于爪哇主岛。“爪哇中心主义”的工业建设导致区域发展极不平衡，中央与地方关系十分敏感。

世纪之交以来的民主改革不仅无法弥补印尼的整合难题，反而消解了原有的国家意志。2004年，印尼实现总统和副总统由全民直选产生；2005年起，省、市、县级行政长官与立法机构由当地直选产生。宪法改革导致一夜之间诞生了550个县级“小王国”。直选进一步弱化中央统领权力，更催生了一切为选举服务的政治生态，当权者常常将劳动福利作为赢得选举的筹码。根据民主改革后的劳工制度，最低工资标准由各地政府自行制定。为了在选举中获得高支持率，大部分地方政府首领选择制定较高的最低工资标准，且年增长幅度达到8%；对企业遣散工人的责任设定得也比较大，达到32倍月薪。这导致企业大量雇用临时工，以规避正式用工的高成本；缺乏稳定熟练工人的企业也急于进行员工培训和产业升级，难以形成强劲的竞争力。据统计，2005年后日本车厂在东盟国家进行的技术转移与人力资源培训时，鲜少涉及印尼，而是多集中于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国。^[27]

与民主改革一同步生的去集权化改革将资源审批权和财政权下放至地方政

印尼的矿产资源大都分布在巴布亚、亚齐等外岛偏远地区，而全国的行政与工业中心又集中于爪哇主岛。这就导致中央政府所在的爪哇主岛必然依赖由国家财政支撑的军队与官僚体系来维持对边缘岛屿的支配。

府，地方获得高度的经济建设自主权。但地方分权并没有产生因地制宜、有效发展的效果，反而滋生了寻租与腐败、行政效率低下、中央权力式微的弊端。印尼不仅无法制定出长期有效的中央经济政策，甚至无法统领地方贯彻实施已有规划。一项针对佐科政府《全国性中期发展规划（2015—2019）》的实施评估表明，脱离民间组织、地方政府与社区组织的支持，中央政策的推行举步维艰。^[28]在选举政治的催化下，印尼甚至掉入“诸侯政治”陷阱，既难以形成共识性的全国政策，也无法得到地方政府的贯彻执行。^[29]在苏西洛时期，惠及全民的基础建设与社会保障政策颁布后始终无以落地。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也没有因分权而改善，爪哇和巴厘岛与印尼东部省份的差距与30年前一样巨大。^[30]

四、佐科的“工业4.0”与印尼再工业化前景

2014年，印尼历史上第一位平民总统佐科上台，其首份全国性战略规划即试图通过基础设施建设解决整合困境，打造一个统一的印尼市场。佐科提出的“全球海洋支点”构想以海洋为承载，致力于打造万千岛屿间的“海上高速公路”，促进东西部经济发展平衡。蓝图将海洋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扩展到苏门答腊、苏拉威西、巴布亚等岛屿，建设与雅加达、东爪哇规模相当的大型枢纽港，不仅试图打破“爪哇中心主义”的发展格局，而且具有快速连接各大群岛的作用。

为了改善印尼制造业的落后现状，佐科政府将“工业4.0”作为印尼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大举措。2018年的《印尼工业4.0路线图》试图将印尼打造为数字时代的全球制造强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2019年4月，印尼国会通过《工业4.0预算修正案》，将财政支持总规模提高一倍，达到5.31万亿印尼盾。2019年开始落实“工业人才4.0计划”，意在培养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素质工业人才，解决人才队伍跟不上技术更新的难题。

大刀阔斧的再工业化改革必定意味着利益的重新分配，佐科面临着重重阻碍。佐科的大量改革一开始就被冠以“再集权化”“新威权主义”的恶名。民主改革后，印尼的社会舆论与民意长期浸淫在西方智库与媒体塑造的“去集权化”的意识形态之中，但凡涉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改革方案，都会上升为威权或集权的意识形态争论。2020年10月通过的《创造就业综合法》将散落在地方的市场审批权限统一收回中央政府，引发全国大范围游行示威甚至社会骚乱。^[31]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印尼的大批基础建设和工业支持计划被迫叫停，以应对疫情引起的经济衰退、企业倒闭、民生保障不足、失业率和贫困率上升等问题。佐科的第二任期已近半，能否在剩余时间中恢复印尼经济尚属未知，更遑论改革的接续和效果。2024年，印尼中央政府必将迎来重组。在印尼多党制的政治氛围下，每个政党都有自己所代表的利益团体和打算，佐科的改革措施能否得到下一任政府的认可和继承也是未知数。为了延续政治意志，佐科

大刀阔斧的再工业化改革必定意味着利益的重新分配，佐科面临着重重阻碍。佐科的大量改革一开始就被冠以“再集权化”“新威权主义”的恶名。

培养儿子和女婿参选地方行政长官，但这种家族政治是否会成为印尼发展道路上的又一陷阱呢？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责任编辑：郑涛）

注释：

- [1] 苏加诺：《苏加诺演讲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127页。
- [2] Hong Liu, *China and the Shaping of Indonesia, 1949–1965*, NUS Press, 2011, pp.205~274.
- [3] [4] [5] Pierre van der Eng, “Government Promotion of Labour-intensive Industrialization in Indonesia, 1930–1975,” in Gareth Austin and Kaoru Sugihara, eds., *Labour-Intensive Industrialization in Global History*, Routledge, 2013, p.179; pp.188~189; p. 189.
- [6] Guy J. Pauker, “Indonesia’s Eight-Year Development Plan,” *Pacific Affairs*, Vol. 34, No. 2, 1961.
- [7] [10] 黄丁兰：《印尼工业发展战略调整浅析》，载《南洋问题》1987年第1期。
- [8] Brad Simpson, “Indonesia’s ‘Accelerated Modernization’ and the Global Discourse of Development, 1960–1975,” *Diplomatic History*, Vol. 33, No. 3, 2009.
- [9] 布迪约诺：《历史大变局中的印尼经济》，龚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0页。
- [11] 林梅、那文鹏：《印尼早熟型去工业化问题探析》，载《南洋问题研究》2018年第1期。
- [12] Guy J. Pauker, “Indonesia’s Eight-Year Development Plan,” *Pacific Affairs*, Vol. 34, No. 2, 1961.
- [13] 林梅：《印度尼西亚工业化进程及其政策演变》，载《东南亚纵横》2011年第6期。
- [14] Jojo Jacob, “Late Industrialization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donesia, 1975–2000,”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Vol.33, No. 3&4, 2005.
- [15] Jeffrey Sachs, Andrew Warner, “Natural 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Curse of Natural Resource,” in G.Meier and J.Rauch eds., *Leading Issu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183~208.
- [16] 毛克疾：《“印度制造”的双重困境——印度工业化的曲折道路》，载《文化纵横》2019年第3期。
- [17] Jeffrey D. Sachs, Andrew M. Warner, “Natural 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Working Paper 5398, December 1995.
- [18] Ari Kuncoro, “Trends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under the Jokowi Presidency: Legacies of Past Administrations,”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Economies*, Vol. 35, No. 3, 2018.
- [19] 高波：《权力结构视角下的发展陷阱——基于对委内瑞拉“蓬托菲霍体制”的分析》，载《国际政治研究》2020年第1期。
- [20] Arianto A. Patunru, Sjamsu Rahardja, “Trade Protectionism in Indonesia: Bad Times and Bad Policy,” Lowy Institute.
- [21] Richard Robison, “Authoritarian States, Capital-Owning Classes, and the Politics of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The Case of Indonesia,” *World Politics*, Vol. 41, No. 1, 1988.
- [22] 平田润：《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危机与政策危机——以印尼为例》，刘晓民译，载《南洋资料译丛》2003年第4期。
- [23] Nicola Bullard, Walden Bello, Kamal Mallhotra, “Taming the Tigers: the IMF and the Asian Crisis,”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19, No. 3, 1998.
- [24] 路风：《走向自主创新：寻求中国力量的源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9页。
- [25]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10页。
- [26] 孙云霄：《国族与部族：印度尼西亚的双轨认同》，载《文化纵横》2019年第3期。
- [27] Yin Ying、戴万平：《由政治经济学途径看印尼产业发展》，载《全球商业经营管理学报》第六期。
- [28] Kharisma Nugroho, Fred Carden and Hans Antlov, *Local Knowledge Matters: Power, Context and Policy Making in Indonesia*, Policy Press of Bristol University, 2018, pp. vii–viii.
- [29] 孙云霄：《政治多元化与利益整合：基于印尼疫情防控政策的分析》，载《南洋问题研究》2020年第4期。
- [30] Dirk Tomsa, “Toning Down the ‘Big Bang’: The Politics of Decentralization during the Yudhoyono Years,” in Edward Aspinall, Marcus Mietzner, Dirk Tomsa, eds., *The Yudhoyono Presidency: Indonesia’s Decade of Stability and Stagnation*, ISEAS Publishing, 2015, p. 159.
- [31] 孙云霄：《印尼〈创造就业综合法〉引发骚乱》，载《世界知识》2020年第21期。

	● Forum: The New Cosmopolitanism of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 Games	
84	● The Transition of the World System over the Fourteen Years between the Two Olympic Games	Yao Zhongqiu
91	● Metaphors of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 Games: The Historical Clue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Li Xiaoyun
	● Focus	
98	● Facing “Quasi-Stagflation”—China’s Economy in the Differential World	Cao Yuanzheng
	●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110	● Difficult Implementation of Fault-tolerance Mechanisms: The Innovation Dilemma for the Local Government	Li Zhen Wang Haoyu
	● The Paths of Late Developers	
118	● Independence or Dependence: The Triple-trap of Indonesia’s Development <i>Indonesia’s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has experienced the twists and turns of “delayed industrialization”, “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 and has fallen into the trap of dependent development amid foreign pressure and domestic turmoil. The reason is that Indonesia’s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faces the triple-trap of resource economic dividend and political immaturity, liberalization reform and loss of economic dominance,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and political reform. Initiated in 2014, although the re-industrialization reforms intends to address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it has had uncertain prospects.</i>	Sun Yunxiao
	● Academic Review	
128	● Stagnant China Can’t Modernize?—Karl August Wittfogel’s Journey to China and the Change of His Perception on Oriental Society	Jiang Pei Zhang Liang
	● Re-explore the West	
138	● Population Aging and Populist Age: Challenges and Causes <i>Population aging has given rise to the current populist surge through two mechanisms. First, it means an increasing share in the society of elderly people, whose nostalgia for traditional values made them particularly attracted to populists who also seek to reshape, if not thwart, globalization. Secondly, population aging has led to an increase in labor costs, which has encouraged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automation, increased the unemployment risks, especially for middle-aged and above workers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Those workers are likely to support populism which promises to promote economic nationalism to reduce social risks in domestic markets.</i>	Meng Ke
146	● The Reborn of Dayt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Rust Belt City	Li Jiaju